

# 寫信，難以磨滅的文化記憶

韓浩月

在《給阿嬤的情書》票房大賣成為全民話題的時候，我與好友綠茶兄的書信集《村郊通信》由浙江大學出版社推出。《給阿嬤的情書》之所以如此受關注，書信元素功不可沒，這部電影說的不僅是夫妻之間的魚來雁去，更有大情大義隱含其中。《村郊通信》的內容是友人尺牘往還，主要談論彼此的閱讀、觀影、旅行生活，但因寫於三年疫情期間，因而也有記錄時代之意。

書出版後，得到的最多回饋是，這年頭居然還有人用紙筆寫信。對我們而言，平平凡凡一件小事，竟然有了「行為藝術」的色彩，甚至有人開玩笑說，手寫書信，可以去申請「非遺」了。想想這才是多久的事情？在新世紀之後，儘管手機與互聯網日新月異，但那時仍有大量人寫信，書信逐漸絕跡於公眾之間，不過是這十來年的事情。將書信的式微歸咎於即時通信，未免簡單，或許更深层的原因在於，人們逐漸失去了慢下來、以儀式感維繫情感交流的耐心。

寫信，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，是常見的日常行為，也是富有情感濃度的文化記憶構成。春秋時期，書信便已脫離「甲冑軍情通報」的單一功用，作為一種文體而定型，《左傳》中已有諸侯卿大夫以書札往來的記載；經歷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，「尺牘時代」涵蓋了公務信息傳送與私人通信，「尺牘」作為書信專用詞沿用至今；魏晉以降，造紙術推廣，至唐宋時期，私人書信迎來第一次全面繁榮，便條、短

札、長信滿天飛，抬頭、落款、用箋、鈐印、封套等有了通用格式；清末、民國，近代郵政系統的不斷下沉，使書信真正走進每一個家庭、每一位個體。

對我們七〇後這代人來說，書信貫穿於整個青少年時期，少年時在學校學習信的書寫格式，開始嘗試通過寫信交友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「筆友」流行，低廉的郵票價格，讓書信史迎來了更為繁榮的時期。當新世紀到來，電子郵件與互聯網即時通信工具開始發達，人們覺察到書信將要消失時，反而激發了極大的通信熱潮，二〇〇二年，當人們驚訝於中國網民接近六千萬人時，全年郵政函件量達人均八點二五件，為有統計以來的峰值，這使人錯覺，無論網絡發展到什麼時代，深厚的書信文化都不會受影響。

我們年輕的時候，太喜歡寫信了。不但自己寫，也非常願意閱讀與書信有關的故事。近代文人愛寫信，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魯迅，一生寫信約為七千封，保留下來的也有一千四百封之多，他與許廣平之間的通信集《兩地書》，成功讓「兩地書」這三個字，成為異地愛情、友情保持溫度與張力的標籤。書信不但是魯迅表達情感的重要渠道，也是他抒發觀點、痛陳時弊的「戰場」，許多未見於正式文章的經歷與感悟，借由書信得以留存，從而更完整地勾勒出魯迅的精神肖像。

比起近代，當代文人互相寫信的頻率，降低了不少。魯迅、胡適、梁啟超等「高頻通信

者」不但寫了大量的信，其中不少信寫完不久就發表在當時的報刊上，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。當代學者、作家雖然迎來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文學黃金時代，但他們更多是通過作品說話，雖然還保持着屬於一個群體、幾個好友之間的通信，但這些通信內容已經很少發表在報刊上，在通信於近代短暫迎來公共表達的平台期之後，很快又回歸到了私人領域。現在活躍於社交媒體上的莫言和余華，在早期寫過極少的信，但余華說和文友們的通信「全燒了」，的確，莫言與余華在魯迅文學院曾是室友，朝夕共處，後來電話方便，幾乎每隔一兩周，兩人便通一次電話，現在被網友捧成「潦草小狗CP」，常常雙雙現身公眾面前，也就沒必要寫信了。雖然能理解，但多少還是有點遺憾。

當代作家裏，愛寫信的有汪曾祺。編劇宋方金曾講過汪曾祺的書信故事，說汪曾祺的文章讀來都是輕鬆愉快的，頂多有一點兒惆悵，但從不表露痛苦，汪曾祺的愛人曾說，你要把你經歷過的痛苦寫出來，汪曾祺堅持不寫，但在一本名為《私信中的汪曾祺》的書裏，汪曾祺致友人的信中，讀者清晰地可以看見他的信中有痛苦、憤怒和憂傷的。

在過去幾年，我與綠茶兄的通信，若是說不受古代文人和現

當代作家的影響，是說不通的，因為我們所受的教育，所成長的環境，都注定離不開書信文化的滋養。曾經，在遠方寫給家人的信，寫給未曾謀面文友的信，甚至在孤獨時刻寫給自己的信，都曾給一段難熬的歲月，帶來希望感和安慰感。我與綠茶兄的《村郊通信》出版了，但我們的寫信行為並沒有停止，前段時間在杭州舉辦的新書首發式上，綠茶兄將一封信寫在書的環襯頁上送給了我，作為經常見面的朋友，仍然通過書信的方式交流，這算是對書信文化的一種繼承和延續吧。當然，我們更是覺得，寫信，在整理與清潔內心，有着無可替代的作用，也是獲得一種較為舒適的生存姿態的一種方法。



五月十五日，在福州展出的「橋批千里報平安——紙墨間的星敏記憶」。中新社

## 七日談

(河北篇)



▲河南嵩山少林寺。作者攝

## 功夫少林的喧囂與寂然



自由談

何威

登封市是河南省鄭州市下轄的縣級市，位於中嶽嵩山南麓，面積很小，僅一千二百一十七平方公里，大致步行一天便能繞縣城一圈。常住人口約七十三萬人。當年因武則天封禪嵩山而得名，一直是歷史文化名城。登封雖小，但卻是儒釋道三家聚集之地，非但沒有彼此排擠，相反彼此相敬如賓，相互促進成全，和西方宗教衝突不斷的情況截然不同。

一九八二年，張鑫炎導演的《少林寺》橫空出世。投資不過二百萬港元，內地票房卻高達一億六千多萬人民幣——那還是電影票只要一兩毛錢的年月。香港票房達一千六百多萬港幣，海外版權又賣了兩千多萬港幣。這部片子不僅救活了一家電影公司，更讓一座千年古剎從此煥發新顏。

若論功夫片的美學脈絡，李小龍打出了實戰的凌厲，成龍打出了雜耍的巧勁，而初出茅廬的李連杰，打出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美感。舒展如雲，疾落如電，一招一式皆可入畫。正是這份美感，讓少林寺從一座有些遙遠的名剎，變成了億萬人心中的真真正正的嚮往。遊人如織而至，習武者心之嚮往，連港產小說與影視劇也把少林推為功夫的最高學府——甚至連反派若是不夠分量，先得給他安個「少林叛徒」的身份；少林也常常是反抗官府的最後一處堡壘，承載着江湖公道與俠義精神。

然而，這座「天下第一名剎」真正的根脈遠在電影之前。它始建於北魏太和十九年，孝文帝為安置印度高僧跋陀而建，因坐落在少室山陰的密林中，故名「少林」。後來達摩祖師面壁禪傳，這裏便成了漢傳佛教（傳去日本）禪宗的發祥地。一千五百餘年的風霜，使它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。禪宗講求在日常中修行，擔水劈柴皆是妙道。因此少林僧人將習武也納入這修行之中——以禪心運武，以武悟禪，最終抵達的，是超越拳腳的精神境界。少林功夫因此成為一個極為龐大的技術體系，拳譜所載原有七百餘套，流傳至今尚存二百餘套，加上七十二絕技與各種功法，蔚為大觀。其要義在「六合」：外合手足肘膝肩胯，內合心意氣力，講究動靜相生，剛柔並濟。

可惜的是，今日走進少林寺，撲面而來的卻不是這般禪意。從停車場走向入口，彷彿闖入一個喧鬧的超大市集。紀念品店鋪鱗次櫛比，武術表演的吆喝此起彼落，人山人海，哪裏有半分寺廟的寧靜？寺內雖設專門的武術表演場，票價不菲，門口免費的表演便被圍得水洩不通。專門的武術表演場本只容三四百人，卻硬塞進雙倍的遊客，站都站不穩，入場秩序亂如逃難。

表演開始前，先來一場書畫拍賣。那些字畫並非寺內僧人的修行之作，而是「業餘大師」的筆墨，滿場的市井味兒。正式的武術表演僅約四十分鐘，硬氣功還算見真章，其中二十分鐘觀眾互動，其餘的大抵是娛樂化的雜耍，和街頭賣藝沒有分別。對於真心崇敬少林功夫的人來說，這非但談不上欣賞，反而讓心中的那份「神聖」瞬間跌落。

更令人悵然的是，「少林寺」這三個字，如今已成了碰不得的版權資產。文化傳播與推廣，本當讓專業的人去做，各自還是該做好自己的本分。中國功夫屢屢申奧失敗，癥結可能也在此——功夫在今天最有價值的，既不在實戰，更不在表演，而在其精神，在其滿滿的儀式感。騎術、擊劍、柔道、空手道，莫不如此。

我總在想，少林寺若能回歸寺廟應有的寧靜，回歸宗教本身的修行，讓禪宗的修煉重新成為功夫的儀軌與底蘊，這份傳承才能繼續輝煌下去。畢竟，一座千年古剎的真正魅力，從來不在於它能吸引多少遊客，而在於它能否在喧囂的塵世中，為世人守住一片可以安頓身心的清涼。



HK人與事

辜雨晴

我在香港住了十幾個年頭了。說來也怪，每次有朋友從內地來，陪他們逛街看景，反而讓我對這個地方有了更深的認識。

自己在這裏待久了，容易把一切當成理所當然——中環的高樓、維港的夜景、叮叮車的聲音，都變成了背景。倒是客人來了，瞪大了眼睛問問那，我才看到了別樣的香港。

周末，我陪一個北京來的朋友在中環閒逛。午飯吃完，想找條清淨的路走走，就從皇后大道中拐進了衛城道。坡有點陡，兩旁是老樹和舊樓，人一下子少了。走到半坡，看見一棟四層樓的淺黃色洋樓，安安靜靜地藏在樹後面。門口掛着一塊牌子：孫中山紀念館。我倆對視一眼，來都來了，進去看看。

走進才知道，這棟樓叫甘棠第，一九一四年落成，是香港第一位首富何東的胞弟——何甘棠的府邸。

同行朋友說：這不就是香港「老錢」嗎？我想，「老錢」的可貴不在吃穿用度有多奢侈，而在國家危亡時肯站出來救亡圖存。正如今天來這兒的人，真正為大家所震撼的，不是這棟樓有多闊氣，而是為孫中山這份愛國救國的精神所深深感動，因而在心中烙下印記。

孫中山年輕時在香港皇仁書院讀書，他在這裏學英文，讀西方法政，也看盧梭和孟德斯鳩。他同時看到了兩樣東西：中國最深的困境和世界最快的腳步。這兩種東西在他腦子裏撞在一起，撞出了一個結論——中國要變，要徹底地變。後來他說過一句話：「我之革命事業，得力於香港甚多。」這不是客氣，是真

## 走進甘棠第 ——參訪孫中山紀念館記

話。

他曾說，從香山到香港不過五十英里，可兩地的差別太大了。能在七八十年裏把一片荒島建成整齊安穩的城市，這究竟是為什麼？正是這種帶着痛感的追問，讓他立志改變中國。

站在香港看中國，跟站在廣州、上海看中國，是不一樣的。

香港是窗口。西方的先進思想從這裏進來，中國的變化也從這裏被世界看見。這不是抽象的概念，是實實在在的人、錢、書、槍。洋行的買辦在這裏學會了現代貿易，茶樓裏的書生在這裏讀到了《民約論》，革命黨人在這裏拿到了海外華僑的捐款。

所有東西混在一起，碰撞，磨合，最後生出新的東西來。

二樓的客廳，鑲嵌着嶺南的彩色玻璃，裝着西式的大壁爐。我們站在裏面，朋友問我：當年孫中山他們就在這裏開會？我說對，窗外是殖民者的巡捕，窗內是推翻一個王朝的密謀。這種地方，當時全中國只有香港有。不是因為她多繁華，而是因為她特殊——她讓不同的文明、不



▲孫中山紀念館館址「甘棠第」。

## 塞納河石橋化身藝術裝置



市井萬象

這是六月二日在法國巴黎拍攝的藝術裝置「新橋洞窟」。

近日，位於法國巴黎塞納河上的新橋被臨時改造成巨型藝術裝置。這件名為「新橋洞窟」的作品，其靈感來源於當年為新橋建設提供石材的採石場。據悉，該裝置將於六月六日至二十八日正式對外開放。新橋始建於一五七八年，被認為是巴黎最古老的石橋。

新華社

